

我的老師（三）：珍惜多元、政教各守其道

郭位 香港城市大學

2019年11月間《自由時報》多篇有關本人的報導，觀點偏頗遠離事實，又涉及我的指導教授黃金來先生。在這段香港不平靜的時候，身任香港城市大學（城大）校長，以師生和大學的安全及穩定發展為優先，延至今日才回應還原真相，希望世人理解為師者堅守的價值與精神。

早於2016年6月5日，我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「我的老師」演說中已有介紹黃金來教授。他沒有受過政治迫害，留學美國，反專制、反戒嚴，所以被列於黑名單上，得到博士學位，不被准許返回台灣。解嚴後，黃老師終於可以隨自己的意志回故鄉，但是他決定不必回來了。

黃教授不是政治人物、反對暴政，卻不想從這裏面得到任何私人利益。這種崇高的態度值得那些視政治凌駕學術，把政治當做學術玩偶，或者把學術當做政治進階工具的世人汗顏！（演說全文請參閱：「我的老師（一）」<https://gvlf.gvm.com.tw/article.html?id=57783> 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2016年7月15日）。

自今年3月香港政府提議推出「逃犯條例」以來，社會動盪，示威遊行無數，警民衝突激烈，暴力不斷升級，大學校園未能倖免。城大遭到史無前例的入侵，除了無形而深遠的負面影響，整修校園費時費力，損失與花費預估上億港幣。

另外一個具體的例子，則是根據香港理工大學的公布：佔據理工大學十幾天的千餘人中只有46人是該校的學生。有外人要求校長公開對談卻又不准許不同意見者參與，當然不必隨之起舞；如此情景，城大並不例外，也有許多不明身份的人士多次闖入校園，阻止對話交流、駐足破壞設施、滋擾課堂教學、竊取腐蝕性化學品、乃至儲存汽油彈。

至於11月11日破壞城大校長室的眾多黑衣人中，一般相信絕大部分並非城大學生；就此而言，如果破壞校長辦公室而得以保全大學，身先士卒，個人並不介意。

生活即教育，連續11年，我每年帶領上千人的城大團隊參加渣打香港馬拉松，這也許是旁人眼中費力的大事，卻只不過是我與眾多學生日常交流的一個小例子。近半年來，我關心師生的安全和福祉，大幅縮減或取消外出，坐鎮大學統籌應變，率先責成兩位副校長在8月中成立「緊急事故應變小組」，與學生教職員交流，提供協調與支援的管道，並在緊急時候清除障礙、維持秩序、安排交通住宿、疏散師生員工。當知悉有學生受傷或被捕時，請學務長即時了解他們的狀況及需要，提出適切協助。

同理，在理工大學被佔據其間，我二度造訪。當聽聞有兩位城大同學被困時，於11月21日，經同意後，進入該校內部，探討對話城大同學、紓解他們的焦慮，並試圖解惑，解他們的惑也解我與同仁之惑。

十月下旬，城大應變小組回應數百條個人及團體所提出的360度面向提問，其為此發表鉅細靡遺的[提問與回應](#)報告顯示，學生群體間對社會動盪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見，關注範圍也非常廣泛：從校園內外安全，課業安排，到要求大學支持個別的觀點，不一而足。譴責暴力和違法行為是文明社會的最低要求，無論執法者或群眾都不可展示非法的肢體暴力或者言語暴力。

相對而言，城大校園受害較小，不同族群個體間的衝突也較少，這些都與大學的妥善處置有關。轉眼間，動盪趨緩，百廢待興，應變小組仍然需要帶頭處置善後，為鋪陳新學期做好準備。我相信也期待著：學問之道，荒漠甘泉；枯木逢春，萬象更新。我書此為節慶新年賀卡兼激勵士氣。

2008年出任城大校長，打開風氣，明訂教研學術為大學發展的主題，警力、政黨、選舉、政治人物、街頭政治、財務及私人恩怨等外力皆不可糾纏大學。大學乃求真理、做學問、從事教研的大雅殿堂，年輕人的能量是社會進步的動力，為了維護自由安全的學術環境，珍惜多元意見，恪守政治中立。討論議題時，務必尊重學術道德，堅守和平與理性。社會人士切勿用政治眼光啟動謠言，政治黑手更不得伸入大學校園。

“政治與教育各守其道”是一以貫之的信念，在我著作的《高等教育怎麼辦？》（台北天下文化，2016）一書中有詳述。聞道有先後，我是學生也是老師，對指導過許多來自天南地北、不同地域背景的博士生，全都如此一體相待。

小學而大遺，未見其明。今人推動高教國際化，容易在枝微末節上費心，或急功近利，或持一偏之見，忽略了“高等教育與政治、政爭糾纏不清”的病態，以致有損學術對社會的長遠貢獻。

《師說》：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。大學自主，如果拋棄大道，而把大學當泛政治化的平台，官盛則近諛，空談虛語蠱惑眾人，那麼不但遠離古人，我們離國際化也還遠著呢！